

仪式中的国家：从祈雨看民国 江南地方政权与民间信仰活动之关系

胡勇军

内容提要 1934年江南发生重大旱灾,苏州城内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祈雨活动,场面万人空巷,历时一个多月而止。活动初期,佛教、道教、理教以及肉业公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宗教祈雨占据了主导,不久之后民间迎神赛会活动开始兴起,并愈演愈烈,将祈雨活动推向高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在疏于防范和救护不力后,出于维持地方秩序的考虑而做出的无奈选择。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的滞后导致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不足,民间迷信活动屡禁不止,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

关键词 苏州 宗教祈雨 迎神赛会 地方政权

胡勇军,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200433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讲师 310018

民间信仰作为“非官方、非教会的下层信仰”^[1],由于其特殊的功能,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而祈雨更是被当作农业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祭祀与礼仪活动。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作为国家宗教之外的一种辅助形式而存在,以便于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清末民初,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发生急剧的转变。目前学界对近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往往把反迷信运动与现代国家建设联系起来,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等二元的视角来考察民间信仰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如杜赞奇试图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解释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进入20世纪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政权不再利用民间信仰等文化资源进入乡村,而是力图斩断其同传统文化网络的联系^[2]。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家与社会互动视野下的江南基层政权与乡村治理研究(1927-1937)”(编号:16YJC770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世江南的城乡环境、地域经济与政治变迁研究”(编号:15JJDZONGHE005)阶段性成果。

[1]关于民间信仰的定义,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参见陶思炎、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破除迷信运动在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沪等地区达到高潮。此后也曾多次实行严禁,但始终是禁而不严,不能从根本上消弭民间迷信活动,其背后的原因多元且复杂。日本学者三谷孝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认为破除迷信运动还包含了很多现实政治的因素,即运动背后隐含着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权力冲突^[1]。沙青青通过对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的个案研究,认为破除迷信运动是基层党政争夺权力的政治工具,两者不同的态度和矛盾斗争致使“打城隍”失败^[2]。艾萍进一步认为面对党部的积极要求,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秩序,在“毁庙”运动中,不知不觉站在了维护者一方^[3]。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破除迷信运动中,国家是政策的顶层设计者和制定者,地方政府是政策的执行者,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上述学者讨论的基层党政纠纷只是其中的一种。

关于1934年苏州求雨的研究,沈洁利用《吴县日报》的报道,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民间信仰、现代政府以及地方各势力群体的互动,勾勒出变迁时代社区传统如何延续与重构的过程^[4]。本文将从地方社会史的角度,利用《苏州明报》、《申报》等相关报纸的报道,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着力探讨在新生活运动开展的1934年,为何苏州还会发生如此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处以仪式之外的地方政府又是如何被卷入这场漩涡之中,及其对民间祈雨信仰的态度有出现了何种变化?民间迷信活动在南京政府时期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仪式与路线：1934年苏州祈雨之盛况

1934年,中国长江流域以及南部地区发生重大旱情,南方数省“赤地千里,禾稼尽枯”,灾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5],受灾面积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为近百年所罕见。根据实业部的估算,江浙皖三省受灾奇重,受灾田地多达10827.2万亩,其中江苏4945.5万亩,受灾田地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54%,主要作物损失约21800余万元^[6]。据《京沪报》和《农报》通讯员报告,江苏受灾的县份主要有江宁、镇江、淮阴、苏州、常熟、松江、宜兴、清江浦、六合、无锡、吴县、金坛、靖江、南通、崇明、东台、海门、阜宁、江阴、昆山、太仓等二十余县^[7],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地区。当时吴县各区农田普遍受灾,“各处农田无不龟坼,所有禾稻多半枯焦,其收成较佳者不过五六成,灾情严重者只收一二成,甚至颗粒无收者,亦比比皆是”^[8]。镇江、溧阳、金坛、高淳一带,地形较高,辟水极为困难,“无从取水插秧,旱灾亦觉严重,能有三成收获已属幸事”^[9]。

面对天旱不雨,民间往往会举行各种求雨活动。江南地区的祈雨习俗自古就有,民间多选择以祭拜龙王、观音、城隍以及其他神灵和已故乡贤名宦的方式进行祈雨^[10]。祈雨作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群体文化模式,一直广泛存在并延续到民国初年。1934年发生旱灾之后,江南受灾地区也多进行祈雨,其

[1][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李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艾萍:《民国禁止迎神赛会论析——以上海为个案》,[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4]沈洁:《反迷信与社区信仰空间的现代历程——以1934年苏州的求雨仪式为例》,[上海]《史林》2007年第2期。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9年)》,[南京]《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6]《民国二十三年全国旱灾调查:江浙皖三省旱灾损失估计》,《农情报告》1934年第9期。

[7]《大江南北亢旱成灾:禾苗枯稿秋收绝望》,《农报》1934年第13期。

[8]《全县颗粒无收田亩317685亩强》,《苏州明报》1934年11月8日,第7版。

[9]冯柳堂:《几及全国之旱灾》,《吴江县政公报》1934年第3期。

[10]林涓:《祈雨习俗及其地域差异——以传统社会后期的江南地区为中心》,[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

中以班禅在南京祈雨,张瑞麟在上海祈雨影响最大。7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以“天久不雨,亢旱异常”,派安钦活佛赴京城四门祈雨^[1]。次日,又派安钦、丁吉、永增堪布、莫布堪布每人率喇嘛7人,分赴汤山、雨花台、玄武湖、九龙桥四处祈雨。班禅离京后还谕留京喇嘛及随员等17人在宝华寺念经求雨,直至下雨为止^[2]。在上海,慈善家王一亭、徐冠南、邵如馨等人会同太虚法师靖海和尚、却非方丈,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并于7月20-23日在新闻路清凉寺设坛,由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麟升坛祈祷^[3]。此后加入祈雨消灾大会的还有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潮州同乡会郑正秋、周邦俊、娄子云、董天涯、董信源及上海四十余慈善团体组织联合会等。

班禅和张天师求雨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南京作为民国首都,班禅祈雨必然是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而上海作为“世界交通地点”,受近代风气影响最深,但各种祈雨活动也大肆进行。受此影响,各地的祈雨活动纷纷兴起,当时有人描述乡民请愿的场景道:“农民赴县请求祈雨唯一的理由就是祈雨算不来迷信,因为首都还在请某某大师祈雨,这是国民政府体念老百姓,爱护老百姓的缘故。”^[4]

苏州民间自古就有“求雨请出铜观音”的习俗。有鉴于此,正在从事善人桥实验区建设的李根源与苏州城绅商议,迎接光福铜观音进城祈雨,“经多数人赞同,复经赞成人方面一度集商后,认为印老此举是为大众求幸福”^[5]。随后众人派顾衡如、洪青圭和何桂芳等人于6月29日下午赶赴光福迎接铜观音入城。30日上午11时许,迎接船只驶抵广济桥河畔,众人将铜观音迎送至宝莲寺内,供奉于大雄宝殿如来佛像前。随即无数善男信女焚香点烛,求签膜拜,“投机之香烛摊,莫不利市三倍,闻若三日不雨,即须设坛祈祷”^[6]。然而祭拜几日之后,依然是焦阳如火,苏州城内佛教、道教、耶稣教、理教以及肉业公会立即举行了各种祈雨活动,不久之后民间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迎神赛会活动。关于苏州城内的求雨活动,沈洁已经做了详细描述,本文不再赘述,重点论述道教公会在玄妙观三清殿摆的八卦求雨阵以及周王出巡路线,以此呈现当时祈雨之盛况。

面对连日亢旱不雨,7月8日,道教公会在雷祖殿打祈雨大醮,并在玄妙观三清殿摆八卦阵,作求雨法事。据悉此种八卦阵图为苏城的一大创举,“苏州道教人士生平从未经历此法事”,也因此被视为“求雨不果之最后一响”^[7]。据参加雷祖殿祈雨大醮的法师说,作法当日的中刻时间,由法师亲自到葑门外取水,戍刻在玄妙观三清殿露台摆八卦阵。露台四周用木板围住,防止闲杂人等进入。道场非常森严,场中排列好干、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位,用杙子高搭起来,遮上黑布,布上写有白字。每个杙上面都放置净水瓶和八卦旗,同时还备有道童3人、引导师3人、法员5人、道士23人,道场直到天降甘霖方才拆除。当日,民众从城乡各处纷至沓来,涌入玄妙观,一睹前所未有之祈雨仪阵。除了大摆八卦阵外,7月10日下午1时,苏州道教公会正、副会长秦琴鹤和顾觉沧等人,率领公会全体法师20人、道士80人,由玄妙观雷祖殿出发,经观前街、景德路、黄鹂坊,出金门,再由横马路、新马路至宝莲寺,在铜观音面前打醮祈雨。法事结束后,全体人员分为四组,每组法师五人、道士20人,分头出发,在各处行香。这也是求雨活动初期,苏州宗教团体举行的规模最大、场面最隆重的祈雨仪式。

[1]《班禅昨派安钦祈雨》,《申报》1934年7月2日,第3版。

[2]《班禅继续求雨》,《申报》1934年7月3日,第10版;《班禅明日北上》,《申报》1934年7月12日,第8版。

[3]《全国祈雨消灾大会昨晚由张天师净坛》,《申报》1934年7月20日,第11版。

[4]雅非:《祈雨》,《申报》1934年7月10日,第20版。

[5]《请光福铜观音求雨》,《苏州明报》1934年6月29日,第6版。

[6]《铜观音到苏求甘霖》,《苏州明报》1934年6月30日,第7版。

[7]《道士碰急令牌求雨》,《苏州明报》1934年7月10日,第5版。

求雨活动进行到中期,效果依然是不甚明显。7月24日,受苏州居民的请求,周王庙负责人员决定举行周王出巡求雨仪式。周王庙位于宝林寺前与天库前之间的周王庙弄内,庙内供奉的是苏州玉业的祖师爷周宣灵王。关于周王为何人,有两种说法。一为周雄,字仲雄,杭之新城人,“在宋锐志恢复,抑郁以股”;另一说法是明季浒墅关人,为苏州本地周神(周孝子)^[1]。周王因“历著灵显”而“屡加封号”,明初纳入国家正祀,封运德海潮王、护国广平侯、总制江海河道兼理三界财帛使司;乾隆和嘉庆时分别加封代天宣化忠静大元帅和诩应将军;道光时钦加“显佑”两字,春秋崇祀。庚申之难中,周王庙遭兵焚而毁,同治年间重新修建大堂、二堂、仪门、头门、戏台、亭阁等,香火再度兴盛。

周王庙按习俗,每逢阴历6月13日举行出巡,但因社会动荡,1905—1933年的29年中未曾出巡过。故而这次举行出巡仪式在城厢内外引起了高度关注,苏州商团本部特派第四支部担任纠察任务,并在辖区内出巡所经过的地方,设置临时岗位,以配合警察维持治安,这也是此前举行的赛会活动从未享受的“待遇”。另外,解饷事宜则由周王庙救火会亲自担任。在仪仗方面,与其他赛会不同,周王会议仗没有龙灯、荡湖船、臂锣臂香等,而完全以玉器物件为主,并谢绝其他仪仗队加入。

关于周王出巡路线,《苏州明报》作了详细报道。整个出巡路线分为三个环节:一是穿辕,出庙向南进宝林寺前,上蒋家桥,吴越坊,一直进梵门桥,高井头,向北三官堂、石子街,穿本庙下表。二是出辕,向东大库前,向南吴越坊,直黄鹂坊,向北过龙阁,转西刘家浜,转北石子街,转西石塔头,进穿珠巷,向东西中市,上皋桥,一直东大街,接驾桥,向北护龙街,上香花桥,转东北街,转南进临顿路,上醋坊桥,走观前街,进观上表。三是回辕,走牛角浜,一直上新造桥,转西旧学前,上广寺桥,一直大成坊,转西走观西察桥,转西卫前街、府前街,转北养育巷,上太平桥,一直水泼粉桥,转西景德路,黄鹂坊,新闾路,穿珠巷,进高墩弄,回辕,大吉大利^[2]。

根据同治年间《姑苏城图》和1940年《吴县城厢图》的比照,周王出巡的路线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沿途经过的寺庙、道观众多,主要有宝林寺、石塔庵、光定寺、泰伯寺、神仙庙、崇真宫、承天寺、报恩寺、天后宫、宝光寺、蒋侯庙、狮林寺、天宫寺、昭忠寺、财帛司庙、玄妙观、宝积寺、夫子庙、让王寺、孝子庙、天王寺、圆通庵、关帝庙、姜太公庙、玄坛庙、西禅寺、温天君庙、二郎庙、火神庙等几十座。出辕时并没有由东大街直接进入临顿路,而是由接驾桥,转北经护龙街进入北街,再转南进临顿路,绕道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经过北街上的报恩寺、天后宫、宝光寺、以及临顿路上的狮林寺。在回辕的时候,并没有选择由玄妙观直接回庙,而是绕道卫前街和府前街,此处也是寺庙云集。这种现象在民间偶像出巡时经常发生,如在晚晴上海城隍数次出巡路线中,上海道署、海防厅、县衙、参将署、守备署、厉坛等处都是必经之地^[3]。

二、从宗教祈雨到迎神赛会：地方政府的态度与民间求雨活动转变

从时间上来看,自6月29日光福铜观音被迎入苏州城内,到8月6日何山庙会被迫停止举行,苏州祈雨活动整整持续了39日,其间经历了由宗教祈雨向迎神赛会的转变。7月15日之前,佛教会在城厢内外广建水陆道场祈雨,道教公会在三清殿打祷雨大醮,并在玄妙观大摆八卦阵,鲜肉公会两次禁屠。在这段时间内,佛教、道教、理教、耶稣教以及吴县鲜肉公会等宗教团体和行业组织在求雨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7月13日前后,祈雨活动的主角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居住在阊门外的江北人首先

[1]关于周孝子的事迹,参见〔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2]《迎神祈雨争奇门胜,周宣灵王将阶出巡》,《苏州明报》1934年7月24日,第5版。

[3]何益忠:《老城厢:晚晴上海的一个窗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抬着龙王出巡,其后民间的各种迎神赛会活动纷纷兴起,宗教团体逐渐从求雨活动中淡出,民间活动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民间迎神赛会活动最初是隐匿不发,然后又在中后期将求雨活动推向高潮,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神祠存废标准》,将祠祀明确分为四类:先哲类、宗教类、古神类、淫祠类。保存的宗教有佛教释迦摩尼、地藏王、弥勒、文殊、观世音、达摩、道教老子、元始天尊、三官、天师、王灵官、吕祖、回教、耶教^[1],由此准确定了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合法性。根据江南各地的情况来看,地方士绅往往是求雨活动最先发起者和组织者,并且多是以官方所认可的佛教、道教、观音等宗教仪式来祈雨。而农民私自发起,利用官方否定的民间信仰来祈雨,往往会遭到地方政府的拒绝,甚至是镇压。如崇德县乡民因祈雨心切,将龙王偶像抬进县政府内,请求求雨,但却遭到县长毛皋坤的拒绝,后发生警民抗击事件,造成两死多伤^[2]。同样在嘉兴地区,平湖县乡民则是抬扛观音偶像,请求县长叩头求雨。县长张周汶知道“乡民愚不可理喻”,乃派代表将观音神像摆于中山纪念厅上,焚香烧烛,鞠躬敬礼^[3]。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待民间信仰中的龙王和国家宗教体系中的观音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公开参与到宗教祈雨活动中。6月29日,江阴士绅祝丹卿、吴汀鹭等人在南街关帝庙设坛,请道教、佛教两公会祈雨。鲍县长、刘公安局局长应邀参加,并宣布禁止屠宰数天^[4]。7月3日,江阴要塞司令谢慕韩也前往关帝庙参加祈雨,拈香祈祷^[5]。除了政府官员祭拜之外,地方政府参与祈雨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即为宣布断屠。7月7日,南汇县政府通令商会和各区公所停止宴会,断屠祈雨。7月13-19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中国佛教会,以“自来官厅每当水旱之际,往往祈祷神明,禁止屠宰,天人感召,求无不应,非迷信也,为民请命也”为由,呈请江浙两省政府、上海市政府禁屠祈雨^[6]。杭州市政府也应市民的请求于17日断屠3日。20日,浙江省政府又通令各县,继续禁屠三天^[7]。吴县的断屠祈雨虽然是由肉业公会发起组织的,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民间行为,没有官方参与的痕迹,但背后必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

求雨初期,各类宗教祈雨活动大肆进行,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对此,民众终于按捺不住,也不顾地方政府的反对而举行迷信求雨活动。据《苏州明报》报道,7月13日,居住在阊门外永福桥的江北人抬着金龙四大王神像最先出巡游街。当日夜间又有救火人员,手持旗帜、灯火游行马路,祈求降雨,沿途经过的商店均放爆竹。当时护龙街公民戈培之、唐仲芳、范君博、朱绍鸿、潘如岗、龚伟南等人,以“迎接龙灯,燃放爆竹,籍增兴趣,殊不知一旦引起火警,危险堪虞”之由,联名呈请县政府禁止赛会^[8]。吴县县政府接到呈请之后发布告示:“查今夏天气亢旱异常,燃放爆竹,最易引起火警,自应严禁。”^[9]布告之中只是饬令公安局查禁燃放爆竹,并没有说明要严禁迎神赛会。由此说明,地方政府并没有想过多干涉民间举行迎神赛会,保持了一种中立的态度。正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认之下,苏州城内的迎神赛会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5-506页。

[2]《乡民祈雨发生惨案》,《申报》1934年7月21日,第9版。

[3]《平湖愚民偶像求雨》,《申报》1934年7月6日,第10版。

[4]《江阴旱象已成电省报灾》,《申报》1934年7月1日,第13版。

[5]《江阴久旱喜得甘霖》,《申报》1934年7月6日,第10版。

[6]《呈请断屠》,《申报》1934年7月14日,第12版。

[7]《农田得雨秋收有望》,《申报》1934年7月22日,第10版。

[8]《僧道祈雨愈行紧张》,《苏州明报》1934年7月16日,第5版。

[9]《县府布告民众禁放爆竹》,《苏州明报》1934年7月20日,第5版。

愈演愈烈,以至出现了“无日不走会”的情景。

7月21、22两日,苏州陆续出现降雨,民众觉得这是他们的求雨活动奏效,感动了上苍,因而热情高涨,城内的迎神求雨活动也达到了一个高潮,相王庙、财帛司、府城隍、温天君、眼目司、驸马府等走会冒雨进行。据《苏州明报》报道,虽“叠降甘露,而出会祈雨之风,绝不因之少息。盖已脱离祈雨立场,而入于出会竞赛矣”^[1]。在常熟,乡民将此次降雨归功于龙王显灵,原本渐熄的赛会又再次发起。另外,因为降雨量偏小,对于干旱已久的农田毫无裨益,而这次降雨又增添了民众的信心,因而各地仍旧供奉龙王,继续祈雨^[2]。

面对连日以来的民间迎神赛会,地方政府无法再继续保持缄默。21日,苏州市公安局局长王伯鳞首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每天都有数起迎神赛会活动,并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迎神仪仗虽然没有达到妨害治安的程度,然而还是妨碍了城内交通以及全城风化的观瞻。农民盼望下雨,但是因为知识浅薄,脑筋简单,以至有迎神祈雨之举,照例应当禁止。“但是目下民气一致,设或官方加议禁止,势必发生冲突,小则酿成殴打流血等事,大则影响社会安宁秩序,故仅向劝导,并禁止燃放爆竹,以防火灾”^[3]。同日,吴县县党部特派员孙丹忱也撰文劝告民众说:“天气炎热,久旱不雨,苗枯田荒,饮料将绝,此为三十年来未有之异象。……天旱就应当设法救济,救济却不必期待神方,希望我阖邑同胞,一方面从速集资购买机器戽水或掘进,一方面全力奉行党政各方决定防旱有效之办法,出一钱得一钱之力,费一日有一日之功,做一工有一工的价值,这才能收救济的实效。”^[4]由此可见,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无论是苏州地方政府还是县党部在这一阶段对于愈演愈烈的赛会活动,只是加以言语上的劝导,而没有采取禁止行动。

然而民众并没有听从地方政府的劝告,赛会活动进入到一种相互竞赛的状态。如虎丘西山庙花王走会,会中仪仗有各种鲜花扎成,虎丘东山庙乡民听到后不甘示弱,决定25日举行东亭王会,出于争赛的目的,会中仪仗的花样,无一不追求新奇。面对局面即将失控,7月25日,苏州公安局以“日前气候转变,已获甘霖。而一般好事之徒,仍籍求雨之名,发起迎神赛会情事,殊与社会治安有关”为由,首次发布通令,严禁迎神赛会,同时训令各分局严格实行^[5]。禁令发布后两日,苏州城厢内外依然举行各种赛会,并且规模丝毫不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王伯鳞局长再次以“城区各分局长废弛禁令,殊属不是”为由,电令各分局长,以后各管境内如果再有迎神赛会发生,绝不宽容,立即记过惩戒^[6],由此地方政府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

面对各地如火如荼的迎神赛会活动,7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令苏、浙两省政府主席、上海市市长:

近日乡村农民苦旱求雨,其苦痛迫切之情,吾人固不胜同感,然一念及教育志未普及,常识之未能灌注于一般人民,又不禁感慨系之。虽当其举行之际,不便过事干涉,致滋纷扰,然事前事后,宜注意于常识之启发,关于旱潦预防,根据学理、生喻曲譬、演讲图说,兼用并施,并重在实物实验,务使之恃人事而除迷信。对于上海为世界交通地点,观瞻所击,且市民常识较为普遍,不同乡农,乃亦有设坛求雨等事,不惟迷信,且近招摇,宜从速禁止,以息顽感,

[1]《虎丘东山庙祈雨出会用癫麻伞》,《苏州明报》1934年7月25日,第6版。

[2]《举赛龙土会盛况》,《申报》1934年7月26日,第11版。

[3]《吴县日报》1934年7月,转引自沈洁:《反迷信与社区信仰空间的现代历程——以1934年苏州的求雨仪式为例》,〔上海〕《史林》2007年第2期。

[4]《非迷信神力所可为功》,《苏州明报》1934年7月22日,第5版。

[5]《各乡农田补救困难迎神赛会无日无之》,《苏州明报》1934年7月27日,第5版。

[6]《公安局严禁声中城内外仍有赛会发现》,《苏州明报》1934年7月28日,第5版。

仰各遵照办理为要。^[1]

接到汪精卫的电令后,杭州市政府当即取消原定8月2日起再度断屠祈雨的计划^[2]。于此同时,苏州地方政府也加大了严禁力度,7月31日光福铜观音在民众的欢送之下乘船返乡,王伯麟随即训令城厢各分局侦缉队严缉参加走会的游民。8月3日,侦缉队拘获4名参与臂锣臂香的游民,4人此前曾参加温将军会、驸马府会、延圣会等活动。胥门外的水仙庙会也因为遭到守城警士的拦阻,而没有敢进城,仅在城外大兜圈子后扫兴而返^[3]。苏州公安局三分局一分所训官陈榕洲因明知水仙庙赛会,于前一日请假离职而遭罢免。阊门外东吴旅社账房职员,因不听旅社社长刘正康的劝告,参加会中骑顶马而遭解雇^[4]。同日,因乡民坚持出会,公安局逮捕了西津桥何山庙会的发起者钱凤高、吴观寿、薛长三人。8月6日,经过多方的劝阻,何山庙会才停止举行。至此,持续了39日的求雨活动在地方政府的严禁之下终于落下帷幕。

总的来看,在整个求雨活动中,苏州地方政府的态度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化。首先,面对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祈雨和肉业公会禁屠,与其他一些地方不同,苏州地方政府没有过多地参与其中。其次,随着民间迎神赛会活动的不断高涨,处于仪式之外的政府开始介入,其态度经历了妥协—规劝—厉禁三次变化。在赛会活动的初期,地方政府没有立即采取严禁的措施,而是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默许其进行。随着赛会活动愈演愈烈,出于维持地方秩序,避免官民发生冲突的考虑,地方政府主要是采取言语上的规劝,但效果并不大。当赛会活动进入一种疯狂的竞赛状态,逐渐超出官方的控制范围之后,地方政府的态度才逐渐强硬起来。尤其是在汪精卫电告江浙沪三地禁止祈雨后,为了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苏州公安局开始逮捕参会民众,严禁赛会举行。

三、力不从心抑或权术控制:民间迷信活动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

传统社会,祈雨是国家生活中一项重要的祭祀与礼仪活动,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清代,官方甚至将祈雨仪式列入祀典,确立为正祀。民国废除了清代的祀典仪式,政府和社会精英中的现代化的改革者把民间宗教和文化领域视作建立一个非迷信的、理性实足的世界的最主要障碍^[5]。民国初期,反迷信运动主要以舆论宣传批判为主,此后又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废庙兴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反迷信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尤其是在处于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沪地区。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启动以“礼义廉耻”为宗旨,倡导生活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的“新生活运动”,各地纷纷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配合中央政府的行动。迎神赛会这一民间信仰行为自然与“新生活运动”格格不入,苏州地方政府因此也加大查禁力度,严禁了城厢内外多起民间信仰活动。

1934年为木渎穹窿会七年一次出会年,会首决议于阴历2月15-17日出会。闻此消息,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随即劝阻12段头和乡民举行庙会^[6],吴县县长则以“值兹农村经济衰落之际,若不严予禁止,不特劳力伤财,实属有碍治安”为由,指令禁止出会^[7]。在多方干涉之下,穹窿会最终被迫停

[1]《汪院长电苏浙沪禁止设坛求雨》,《申报》1934年7月31日,第3版。

[2]《杭州停止断屠祈雨》,《申报》1934年8月3日,第9版。

[3]《严禁赛会拘拿游民》,《苏州明报》1934年8月3日,第6版。

[4]《赛会外史》,《苏州明报》1934年8月4日,第6版。

[5][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6]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印行1935年,第35页。

[7]《禁止穹窿山迎神赛会》,《苏州明报》1934年3月8日,第6版;《警局取缔停止举行穹窿赛会》,《苏州明报》1934年3月18日,第7版。

会^[1]。阴历3月26—28日为东岳大帝圣诞,以往湘城乡民必定举行庙会,邻近陆墓甚至常熟等地乡民也前来参加。吴县公安局饬令第十分局长惠侠斌,以“酬神赛会早经奉令取缔在案”为由,禁止出会^[2]。陆墓区北雪泾城隍庙每逢阴历3月27、28两天举行赛会,后因地方政府禁止没敢举行^[3]。阊门外枫桥何山城隍庙每年阴历4月间举行何山神会,1933年虽经公安局禁止,但依然出会^[4]。1934年,乡民商议于阴历4月17日出会,木渎公安局和枫桥镇长随即劝阻,以“去岁举行神会,劳民伤财,影响治安,实非浅鲜”为由,严禁出会^[5]。

然而就在1934年7月,苏州城内却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求雨活动,场面规模宏大、万人空巷,历时一个多月而止。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苏州地方政府对于民间信仰活动的态度大相径庭,而这种因旱灾致使政府态度急剧变化的现象在安徽更为明显。在旱灾发生之初,安徽省公安局为了破除迷信,禁止祈雨,当时有儿童抬着载有龙神牌位的纸轿游行街市,都遭到警察的制止。随着旱情不断加重,佛教会和慈善团体纷纷建醮诵经,乡民扛抬着龙神成群结队进城请愿。在乡民的请求下,省公安局先后两次禁屠祈雨,公安局长张本舜、怀宁县长孙霈方甚至偕地方士绅,前往大龙山龙王庙拈香祈雨。当时有人对这种前后强烈反差的行为评论道“此为民十六年以后罕见之现象”^[6]。表面上看,旱灾导致地方政府态度发生急剧变化,那么为何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己任的政府在灾害面前会妥协,这背后深层的原因值得探究。

大旱面前,粮食、饮水和医疗是民众最为关切的,一旦处理不及时就会引起恐慌,导致社会动乱。然而自7月以来,苏州城内的米价连日攀升,甚至有一日两升的现象。2日,米价每担涨至九元五角。10日,米价突破十元大关。11日,米价突然涨至十一元一角,相比平时最低价六元八角,竟然涨高三分之一^[7]。12日,朝市米价还是十一元,暮市就涨了四角^[8]。面对半个月以来节节攀升的米价,吴县县长直到14日才以“米价腾贵,贻害民生”为由,约请苏州商会主席施筠清到县政府商谈抑平办法,最后商定米价不得超过十元。15日,施筠清召开米业会议,传达县政府指令。当日,平时并不到苏州采购粮食的常熟米商前来购米,一下子导致苏州米市突然紧俏,米商不但没有遵照县政府指令降低米价,反而把价格抬高至十二元^[9]。16日,因为县政府抑制米价的决定以及各米行传言将采购洋米,米价才得以稳定,但是当日的最高米价为十二元四角^[10]。从10日至16日,短短七天,苏州城内的米价就飞涨了两元多钱,民众的恐慌可想而知。

天气亢旱,往往会导致传染病流行。据苏州公安局统计,六月份苏州城厢内外患传染病者801人,死亡人数129人^[11],平均每天死亡4.3人。7月份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3日,苏州城厢内外就有10

[1]关于禁止穹窿会赛会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小田:《社区传统的近代命运——以苏州“穹窿老会”为对象的例案研究》,〔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2]《湘城举行迎神赛会》,《苏州明报》1934年5月11日,第5版。

[3]《苏州陆墓乡赛会演惨剧》,《申报》1934年5月16日,第10版。

[4]《何山会坍塌伤人》,《申报》1933年5月22日,第7版。

[5]《禁出何山会》,《苏州明报》1934年5月9日,第5版;《公安局查禁何山神会》,《苏州明报》1934年5月11日,第5版。

[6]《皖省旱灾概况》,《申报》1934年8月2日,第10版。

[7]《米价今日涨至十一元》,《苏州明报》1934年7月12日,第5版。

[8]《苏米奇俏一日两涨价》,《苏州明报》1934年7月13日,第6版。

[9]《人心益坚飞涨五角,今日一律十二元》,《苏州明报》1934年7月15日,第5版。

[10]《米价坐定》,《苏州明报》1934年7月17日,第5版。

[11]《时疫流行死亡相继》,《苏州明报》1934年7月17日,第5版。

名居民死亡^[1],4日,死亡人数迅速攀升到35名^[2]。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气炎热,民众防护不当,患疾而亡;另一方面适逢新旧县长交替之际,时疫医院的设立比往年有所推迟。7月2日,吴县公安局局长鉴于“劳力苦工者,于此炎热之日,时有冒血头昏等症发生”,呈请县政府迅速筹备设立时疫医院。次日,县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由县政府和公安局邀请救济院以及地方热心公益人士筹备防疫事宜。直到7月13日,才正式发布告示,借天赐庄博习医院、西北街奉直会馆、金门外宁波会馆,设立三家时疫医院,免费医治患者。而在9日,地方人士方嘉谟创设的惠民医院就已经开设时疫医院,免费医治患者^[3]。

随着旱情不断加重,粮食价格逐日攀升,疫情肆虐,而地方政府却处理不及时,甚至是无力救护。吴县县政府对此也坦言承认:“乡农秋收,势将绝望;地方官厅虽然已经着手进行救济措施,比如购买灌水设备等,但仍恐终不能救济什一。”^[4]无奈之时,居民不得不借助于民间求雨仪式来祈求上天的怜悯,释放内心的恐慌。为了维护地方秩序和社会稳定,苏州地方政府不得不暂时对民间的迎神赛会活动妥协,以此让农民心里积压的恐慌得以宣泄。如果政府不顾民意,极力禁止,则极有可能会引发官民冲突。由此可见,在没有采取有效的赈灾举措之时,地方政府只能用一种所谓的体恤民意的无奈行为来放松对民众的控制,以缓解社会紧张,这与其说是对民众迷信祈雨活动的妥协,倒不如说是地方政府管理和控制力量的不足,给民间信仰保留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实际上,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民间迷信祈雨活动的妥协也是地方政府控制民间社会的一种权术。雨水关系到农业的收成,而在水利设施不尽完备的时代,求雨活动自然就成为众多信仰仪式中最被重视的一种,是国家“体恤民瘼”的表现。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泾渭分明的不妥协态度,常常导致自己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也常常反过来,使自己为社会平衡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行为,失去合法性理据”^[5]。另外,地方政府允许民间求雨活动的进行还可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从而推卸自己疏于防患以及救护不力的责任。正如时人所说:“夫迷信不应提倡,地方管理,宁不知之?大灾已成之后之求神拜佛,其无济于事,亦宁不知之?徒以防患之策既疏于前,补救之方,又乏于后,在眼前一筹莫展中,如是聪明之执政者灵机一动,思得一转移民心之办法,即将将灾祸之责归之于不可知之天。”^[6]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民间迷信求雨活动的妥协,甚至是参加到求雨活动中,实际上与传统社会的做法无异,即以此来重新收服民心、获得权威的认同与重视,同时还能推卸自身的责任,一举两得。虽然这种对民间不良风气的妥协行为或许在抑制民众恐慌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有所裨益,但也让现代民族国家政权比专制王朝处于更加尴尬和难堪的境地。

与王朝时代做法不同的是,尽管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允许民间迎神赛会活动进行,但也是力争将其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并于适当的时机发布禁止的政令。在各地迎神赛会愈演愈烈,并出现竞相争斗的场情况,为了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以及挽回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的脸面,汪精卫颁布禁止祈雨的禁令,地方政府也加大了严禁力度。那些组织宗教祈雨的地方士绅以及社会团体自然会配合政府的命令,而民众的热情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宣泄后也逐渐趋于平淡,苏州光福铜观音被欢送回乡,大规模的赛会活动也戛然而止。尽管还有个别走会活动,但在公安局武力的干涉之下,不得不立即停

[1]《时疫流行死亡相继》,《苏州明报》1934年7月4日,第5版。

[2]《疫势猖獗死亡日益》,《苏州明报》1934年7月5日,第6版。

[3]《惠民时疫医院开诊》,《苏州明报》1934年7月5日,第6版。

[4]《吴县日报》1934年7月,转引自沈洁:《反迷信与社区信仰空间的现代历程——以1934年苏州的求雨仪式为例》,〔上海〕《史林》2007年第2期。

[5]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6]基:《救灾声中之迷信问题》,《扫荡旬刊》1934年,第4-5页。

止。由此可见,处在仪式现场之外的国家权力并没有停止对民间祈雨活动的干预,不管是严禁还是妥协,地方政府首先考虑到的是维持社会秩序,这也是影响其构建政府权威的重要因素。正如小田所说,地方政府以“破除迷信,文明生活”相号召,加大了禁止庙会的力度,但官方更多关心的是既存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稳定,而不是对“民智”的启迪^[1]。

结 语

传统社会,王朝国家通过宗教、民间信仰、神话等多种渠道深入社会底层,从而达到控制地方的目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将改造民间信仰纳入到了创建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对此地方政府开始对民众的信仰活动进行镇压,然而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又不得不向民间迷信活动妥协。正如本文在分析1934年苏州民间求雨与地方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时发现,当旱灾的破坏程度超越了地方政府的救护能力范围,国家不得不对民间信仰妥协,甚至还参与到其中,以此来缓解社会的恐慌,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以及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既是一种力不从心的无奈选择,也是一种控制地方的权术,而南京政府对民间信仰活动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为己任,但为了维护地方秩序和社会稳定,也不得不向民间迷信妥协,这种行为显然违背了自己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初衷,既追求现代又无力与传统完全决裂,这也正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性。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仅是通过反迷信运动等各类形式就能达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还必须具有强大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以及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如果国家具备这些能力,广大的民众也不会通过迎神赛会这种愚昧的求雨仪式来感召不可预知的上天。

〔责任编辑:肖 波〕

National ceremony: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nan Area authorities and Folk Belief Activities from Rain-praying in Republic of China

Hu Yong-jun

Abstract: In 1934, a grant rain-praying ceremony, lasted for over a month, was held in Suzou city to deal with the drought in Jiangnan area. At the beginning, this ceremony was led by such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the meat industry association, etc. Later, folk belief activities bloomed and became increasingly fierce, turning it into a mess. The authorities' negligence and insufficient security in the beginning lead to the chaos, and its remedial measures made the whole event out of control. Thus it can be seen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was not well constructed, this lack of control could not stop the prevailing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in society. There is a long, tough path to march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al state.

Keywords: Suzhou rain; religion; an idolatrous procession; local government

[1]小田:《社区传统的近代命运——以苏州“穹窿老会”为对象的例案研究》,〔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